

整合質與量研究法再思

錢 玉 芬**

摘 要

質與量的研究取向在學術研究上各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來有許多學者主張此二大研究取向應予整合，並且進一步提出諸多整合的方法。學報 64 期中江明修教授的「社會科學多重典範的爭辯—試論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整合」一文，也試圖討論質與量研究法的整合問題，為回應江教授的看法，本文再試圖從鉅觀到微觀到微觀等不同層面比較質與量的研究，並且進一步討論質的研究取向所主張的精神後，認為質與量研究取向的對立，並無法因質與量研究方法混合併用而消弭或減緩。因此，本文試圖提出質化經驗主義，存而不論及後典範思想等觀念，來思考如何超越質與量研究典範之對立。最後，本文建議當從研究者對研究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研究者釐清自己的世界觀著手，並且在學術教育上重視對科學哲學的探討，才是國內學術研究界的當務之急。

前 言

人們探索其所賴以生存的世界是一種基本需求，這種基本需求促使人們會注意周遭環境中的訊息，並且嘗試去了解、解釋，進而預測、控制環境（Heider，1974）。由於這種需求具有普同性（或稱普遍性），因此不論是一個專業的學術研究者或是一位平凡無奇的市井小民，在其心目中都各自有一套探索世界、認識環境的方法與原則。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

* 感謝匿名的審查人寶貴的意見及細心的指正，使吾人在思考上獲益匪淺。

** 本文作為本校心理系講師，亦為本校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我們便稱此為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但如前所述，由於研究者心目中所認定的研究方法會因諸多因素，如：研究題材、研究者個人對世界的信念、或學術界的風氣、潮流……等，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因此學術領域中所呈現的研究方法與一般市井小民用以探索環境的方法一樣，是多樣而難有定論的。

雖然如此，但一般在社會科學界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大體上仍可區分為質的 (qualitative) 與量的 (quantitative) 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這兩種研究取向雖然都是以探究世界實體 (reality) 為主要目的，但由於研究者對世界實體的信念不同，因而導致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在許多層面都有所不同，上自哲學層面的學術傳統與基本前提，下至方法技術層面的研究歷程與研究結果呈現的方式等均有差異。這些差異常有學者加以討論比較，例如江明修 (民 81, 334 頁) 曾經提到：

最近，有不少的學者嘗試比較兩種不同方法，如雷斯特 (Rist, 1977)、夏爾門 (Shulman, 1981)、史密斯 (Smith, 1983)、貝納茲 (Bednarz, 1985)、兒仁德 (Allender, 1986)、史密斯和黑修勳 (Smith & Hshusius, 1986)、懷斯同 (Firestone, 1987)、柏萊門 (Bryman, 1988)、巴頓 (Patton, 1990)、黃政傑 (民 78 年) 與張鈿富 (82 年 2 月) 等人。一般而言，上述學者不外是從下列兩個層面來區分，一為方法論層次，探索兩者在本體論、知識論、人性假設與世界觀等鉅視方面的不同；另一為實際研究方法操作層次，說明二者在研究設計、資料蒐集、資料分析，甚至信度、效度評估等微視方面的不同。

當學者們比較過質與量的研究方法的差異之後，經常呼籲兩種研究取向應整合併用才是學術界日後的努力方向。事實上，也有學者曾經提出多種整合質與量研究方法的型態 (Patton, 1990; 江明修, 民 81)。然而，在觀點相當對立的哲學前提上衍生出的不同研究方法，是否能如江明修等人所言，能夠如此簡單地加以整合而不牽強？基於這點質疑，本文試圖再次比較質與量的研究取向的差異，並且探討「質與量的研究方法能否整合？」此一問題，以期在各方樂觀地認為質與量研究「應該整合」「可以併用」的聲浪中，重申學術界不應以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為滿足，而是應該更重視對知識本質與科學精神的探討。

基於上述目的，本文的重點將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從鉅觀到微觀的角度，分層比較質與量研究取向的差異。

第二、從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層次分別討論質與量研究整合的可行性與方向。

壹、質與量研究取向的差異比較：

許多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經常依據所收集的資料的性質（質化或量化）來歸類某研究是屬質的研究抑或量的研究。例如：柯華威（民77）的研究「教室規矩——一個觀察研究報告」，被邀請在「質的探討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但若詳細研讀，則可發現此研究是以量的研究之精神與原則進行質化的觀察資料的收集。

此外，在洪錫井（民80）的碩士論文「心理學質的研究之探討」一文中，在「心理學使用質的研究之概況」一節中，便以研究資料的性質來劃分何者為質的研究，何者為非。

這些學術界的現象說明了一般對質的研究未深究的人對於質的研究的刻板印象是：認為質與量的研究法最大的差異乃在於所收集的資料是質化還是量化的資料。但事實上質與量的研究的差異呈現在許多方面，因此本文首先擬從鉅觀到微觀，從高層概念到低層概念逐一來加以比較：

一、世界觀不同：

世界觀(world view)是指一種普遍性的觀點，是分析複雜的真實世界的一種方式（吳瓊恩，民78）。在相同的世界觀下，就如同學者們者都戴著相同的眼鏡觀看世界，因此在研究領域中便形成一種普遍性的、如 Kuhn 所言的典範(Paradigm)。典範的意義，Kuhn（1962）認為有兩層意思，一是代表某一學術社群的成員所共同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所構成的整體；另一則指某一專業團體共同的解謎範例。

質與量的研究最重要的差異乃在於有不同的世界觀，並且源自於不同的科學典範。首先，量的研究是在「實證論」(Positivism)典範支持下所的發展出來的研究取向，而實證論的世界觀乃認為世界實體中有「唯一且客觀」的真象存在，世界是由穩定、不變的事實所組成。也就是說，實證論者假定世界是一靜態的機械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瞭解世界可以穩定地以

切割的方式逐一探討。在這種世界觀的引導下，社會科學的量的研究與傳統的自然科學一樣，重視在研究情境的嚴密控制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質的研究取向則源於「自然論」(Naturalism) 典範。自然論的世界觀主要是認為世界實體是人們透過經驗與主觀所建構的，因此世界實體中的真象是多元的，完全視個人與集體對環境的界定而定。在這種世界觀的引導下，質的研究並不諱言研究時的主觀性 (Erickson, 1973)，並且重視研究情境中無法分割的整體性 (holistics)。

實證論典範與自然論典範除了對世界實體的本質看法不同外，還有許多方面有著根本的差異 (吳瓊恩, 民 78; Bryman, 1988) 這些差異在在都影響到質與量的研究取向在其它方面有顯著的不同。

二、研究目的不同：

(一) 預測控制 V.S. 描述了解

「描述→解釋→預測→控制」一直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目的，尤其「預測」與「控制」更是量的研究所欲達成的最高目標。此研究目的背後的基礎實與量的研究取向所抱持的世界觀有關。由於量的研究相信有「客觀的真象」存在，因此只要透過量化的研究找出此「客觀的真象」，確立事物的因果關係，便可進一步預測未知的情境並控制成人類所欲求的情況。

而質的研究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預測、控制，而只在於對社會諸多現象的描述與了解 (understanding) (王文科, 民 79; Pauly, 1991)。因著「多元實體」的世界觀，使得質的研究者重視探討在不同環境條件下，人們所建構的實體為何的問題，因此「描述與了解」是整個質的研究的核心目標。

(二) 建立通則 V.S. 研究脈絡：

隨著「預測控制」的研究目的而來的另一個量化研究的目的，便是「建立通則」(generalization)，因為唯有建立出人類行為或社會現象的通則，才能加以預測，進而控制。

然而，因為質的研究者相信，人類行為會深受行為發生的情境影響，因此如果研究者無

法掌握行為情境的脈絡(context)便無法了解人的行為(wilson, 1977)。因此雖然質的研究者也會建立通則，但質的研究所建立的是「受脈絡限制的通則」，而不是一種企圖「放之四海皆準」的通則。

三、研究歷程不同：

長以來「觀察－假設－推論－命題－收集實證資料－結論－預測」此過程是科學研究奉為圭臬的標準格式(洪錫井, 民80；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 民79)。而由於量的研究是源於科學研究之精神，因此，上述的研究過程也是量的研究典型的研究歷程。在這個研究歷程原則下，研究之步驟是「事先」設計好的，研究者遵循著這既定的過程逐步(step by step)進行。

質的研究在研究歷程方面，與量的研究有諸多不同，首先，質的研究者是不擬研究假設的(Pauly, 1991)，因此也無驗證、預測……等後續步驟。再者，質的研究歷程所採用的是所謂緊接著的設計(emergent design)，也就是每一研究步驟(或稱過程)的決定，係仰賴先前所收集到的資訊而定，而不是依循一套事先決定的研究過程，因此質的研究過程是研究者與資料互動的歷程，這點應該是質與量的研究歷程最大不同之處。

四、研究方法不同：

質與量的研究方法由於前述世界觀、研究目的、研究歷程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使得質與量的研究在實際進行研究時，一些與研究方法有關的細節也有所不同。但在介紹這些細節上的差異之前，二者間有一個研究方法取向上的基本不同必須先行介紹，那就是量的研究經常是一種分割情境、孤立變項，且偏重數量分析的一種研究；而質的研究則是一種整體取向(holistic approach)的研究，其所重視與強調的是研究對象、研究主題與整體環境有一種不能切割的整體關係，因此質的研究不事先擬假設(hypothesis)，不設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s)，也不界定變項(variables)(Pauly, 1991)，而主張研究應該在保持環境完整性的前提下進行研究。

因著這種研究方法取向上的差異，質與量的研究在樣本的選取，研究工具的使用、研究

方法（技術）及資料分析技術的應用都有所不同，這些細節上的差異請詳見表一。

表一：質與量的研究法在研究方法上之比較

比較項目	量的研究	質的研究
樣本	大量的隨機、立意或分層抽樣。有系統、精確並能控制某些變項的樣本。	不作代表性的抽樣，但以小型的、具有完整意義的較小單位為對象。
工具	目錄、問卷、測驗、電腦、量表等可量化的測量工具。	錄音機、手抄寫、研究者常就是研究的主要工具。
方法（技術）	實驗法、調查法、結構化的訪談、問題觀察、準實驗法……。	觀察法、參與式觀察、開放性訪談（深度的、非結構或半結構的……）。
資料分析	資料收集完成後才分析，統計分析、演繹的分析。	持續進行的、概念化的詮釋的、歸納的分析。

（參考歐用生，民 78，44 頁；Bogdan & Biklen，1982）

五、研究者的角色不同：

理想上，量的研究者為了保持客觀，主張研究者必須與研究對象分開，以避免主觀偏見，而且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只有在收集資料期間，是一種短期的關係。

而質的研究者並不諱言主觀，因此研究者經常「浸淫」於研究對象與研究情境之中，用其「訓練有素的主觀」檢視、批判、詮釋其所收集到的資料（Erickson，1973）。

因此，量的研究者與質的研究者在研究時，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而且在收集資料時與研究對象互動的程度亦有所差異。

六、研究資料呈現方式不同：

對一個閱讀研究報告的人來說，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是表面且明顯的不同，應該是在研究資料呈現方式上的差異是最容易分辨的。一般而言，量的研究是以數量統計結果的圖表做為呈現資料的方式，而質的研究則是以描述性（discriptive）文字敘述來呈現其所收集到的資料。

從上述諸多面向的差異比較中，世界觀的差異似乎是質與量兩大研究取向最重要也是最

根本的衝突所在。正如 Thompson (1989) 所言：過去二十五年來批判量的研究的聲浪愈來愈大，也愈來愈多，而質的研究典範更是結合這些批判觀點，對量的研究傳統提出嚴重的批判。因此，質與量的研究典範代表了兩個對立的世界觀是無庸置疑的。而 Patton (1975) 認為世界觀的存在，一方面對研究者的研究行動 (research action) 發揮了指導的功能，另一方面卻又讓研究者對研究行動背後的預設 (assumptions) 不加懷疑。從這個角度看來，不管是質的抑或量的研究，世界觀將引導研究者對研究目的的期望，對研究歷程與研究方法的設計，及對研究者在研究中角色的界定等。因此，世界觀的差異是質與量的研究不同的主要根源。

貳、質與量研究法之整合：

長久以來量的研究法一直主導著社會科學的研究，然而這種以實證論世界觀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界中已被喻為「明日黃花」的研究技術。因為誠如吳瓊恩 (民 78) 所言：

實證論所呈現的世界觀，僅能使研究者孤立在極為狹小的範圍內，結合統計方法的運用，以求變項間的直線關係，這就隱含了一個基本預設，即世界是靜態的機械結構，必須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把一個活潑動態發展的世界，毫不自覺地化為一片死寂的物質世界，然後從整體中抽取部分，設定自、依變項來求其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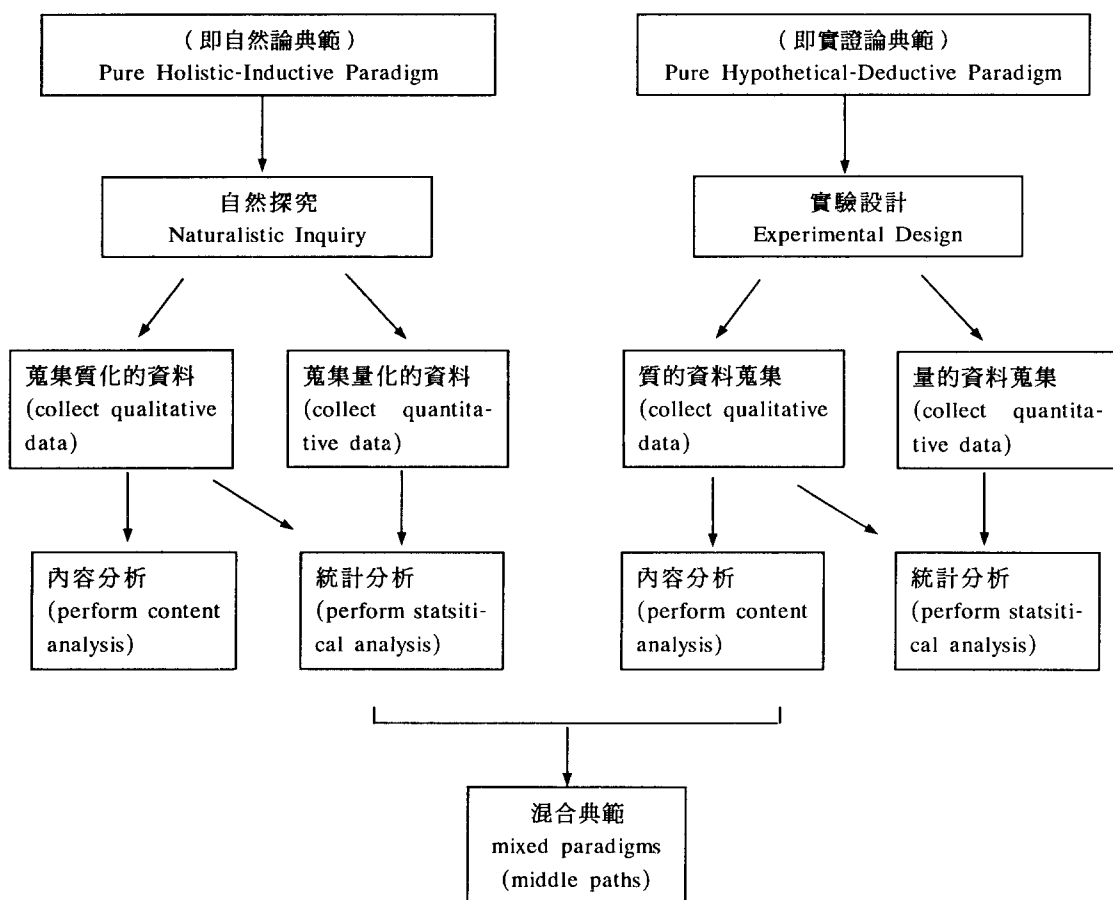
雖然如此，量的研究取向累積了過去百年來的研究成果，在社會科學界中仍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而質的研究，由於其所持有的自然論世界觀，已成為社會科學中各學科典範的變遷趨勢，正以銳不可當的氣勢，在各領域中引起極大的震撼與關注。例如：吳瓊恩 (民 78) 曾舉例分析了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物學、政治理論、行政學、語言學、經濟學等各學科，發現各學科近年來的「實質典範」的變遷趨勢都與自然論典範的主張暗合，因此學者們紛紛主張各種研究典範要對話與交流，甚至整合 (江明修，民 81，Patton，1990)。

然而在思考質與量研究的整合問題時，顯然牽涉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為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的層次，一為方法論 (methodology) 的層次。讓我們分別來看：

一、在研究方法方面：

Patton (1990) 曾經明確地建議質與量的研究方法應該混合 (mixed) 應用，因而提出四種質與量研究法的整合型態 (如圖一)：



圖一：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整合

資料來源：Patton，1990：195

整合質與量研究法再思

- (一)整合 I 型：量的實驗研究設計、質的資料蒐集與質的內容分析。
- (二)整合 II 型：量的實驗研究設計、質的資料蒐集與量的統計分析。
- (三)整合 III 型：質的自然研究設計、質的資料蒐集與量的統計分析。
- (四)整合 IV 型：質的自然探究設計、量的資料蒐集與量的統計分析。

此外，江明修（民 81）也另外提出兩種整合類型：

- (五)整合 V 型：量的實驗研究設計、量的資料蒐集與質的內容分析。
- (六)整合 VI 型：質的自然探究設計、量的資料蒐集與質的內容分析。

事實上，江明修補充的兩個整合型態，是 Patton 認為不可行的型態，以第 V 型為例，Patton 認為在實驗設計，及量的資料蒐集的研究情境下，質的內容分析是不可能進行的（Patton，1990，p.195）。

但姑且不論上述六種整合型態的可行性為何，很明顯地，這幾種質與量研究法的整合型態基本上僅是研究設計、蒐集資料之型態及資料分析方法三個層次，配合質與量的概念排列組合，排除純粹質的研究（即自然探究質的資料與內容分析）與純粹量的研究（即實驗設計、量的資料與統計分析）後而剩餘的幾種型態。許多學者也多從此一角度建議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同時運用多重方法 (multi-method) (Brewer & Hunter，1989) 或多重角度的校正 (triangulation) (Denzin，1978；Jick，1983；Christians & Carey，1981)，亦即質與量的研究方法聯合應用，互補長短 (Bryman，1988)。

但筆者認為在研究方法上的混合使用是容易的，但讀者若因此便以為質與量的研究法整合不是難題，則是過於樂觀的想法。

Christians & Carey (1981) 曾提出質的研究有四大判準(criteria)：

- (一)自然主義的觀察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

即質的研究進行觀察與資料的蒐集時，藉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研究情境的深度融合，以求在完全自然的情境下進行。研究不能因為研究者「突然」介入，而破壞其自然情境。

(二)重視情境脈絡 (contextualization) :

質的研究強調研究題材不能從環境 (情境) 中抽離，因此質的研究者對某一研究題材必須是同時精熟時間性與空間性情境脈絡，才能從研究資料中，找出真正的意義，避免浮面上的描述與解釋。

(三)最大範圍的比較 (maximized comparisons) :

質的研究為要提升資料證據對資料本質的解釋力，主張在研究過程中重視時間面與空間面的擴大範圍比較，而反對僅單一點 (one-shot) 的資料蒐集。

(四)發展高敏銳度的概念 (sensitized concepts) :

對質的研究者而言，概念的發展與建立乃是為詮釋意義，而非為事物下定義。因此，如何發展出高敏銳的概念，以詮釋人們的共同經驗是質的研究所重視的。

從這四項判準來看，前述學者建議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對整合質與量的研究並無多大幫助，因為：

(一)以量的實驗設計為主的整合型態 (如整合 I、II、V 型) 仍是屬於量的研究。因為實驗設計基本上是在一個由研究者事先設計好的情境下進行研究，為了求得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嚴格地控制研究者認為的無關變項。這種研究方式與質的研究主張自然主義的觀察、重視情境脈絡的研究原則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不管其所蒐集的資料是量化或質化的，其分析方法是內容分析還是統計分析，它都還是不折不扣的量的研究。

(二)以質的自然探究設計為主的整合型態 (如整合 III、IV、VI 型)，仍是屬質的研究。Christians & Carey (1981) 在提到四大判準之前曾經澄清一般人對質的研究的兩大誤解，其中之一便是一般人常認為質的研究是絕對反對量化與統計數字的，事實上質的研究並未排斥數字或量化的資料，而對於統計分析，質的研究只是無法接受與質的研究精神相左的某些統計方法 (例如：質的研究者並不認為事物、現象一定是常態分配的)，並不是反對所有的統計方法。因此只要是符合質的研究之自然探究原則的，還是屬於質的研

究。

因此從上述的分析來看，質的研究還是質的研究，量的研究依舊是量的研究。質、量研究取向的對立仍未因此解決或緩和。

二、在方法論方面：

在比較質與量研究取向一節中，曾經提到世界觀的不同是質與量研究的主要差異來源，因此從方法論的層面來探討質與量研究的整合問題，似乎是較根本的辦法。

然而，自然論典範與實證論典範在哲學方法論等觀點上是對立，且爭辯多年的（吳瓊恩，民 78；Anderson，1987；Bryman，1988；Patton，1990），Kuhn（1962）認為不同典範之間具有不可共量的特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若再爭辯質與量的研究取向孰優孰劣，是徒勞無功的作法，但這並不意味世界觀的問題在研究時是不重要的。相反的，有多位學者在思考解決此一衝突時，曾嘗試提出新的觀念或引用其它領域的重要概念，試圖打破質與量研究在世界觀上的對立局面，例如：

（一）質化的經驗主義（qualitative empiricism）

Anderson（1987）在探討傳播研究的方法時指出：質與量研究對世界的看法顯然是對立且不相容的，但是論到人類經驗的本質，質化研究與經驗研究卻未必互斥，因此建議研究者用工具主義觀點（instrumentalist point of view）以研究目的來選擇不同的典範。無獨有偶地，在歐陸的傳播研究也打破質的研究傳統，從此綜合的觀點開始接收分析之研究（reception analysis studies）（Jensen，1986，1987，1988）。而 Lull（1990）受 Anderson 的影響，將此觀點稱為質化的經驗主義，並用之於美國的閱聽人研究（audiences research）中，傳播學界的新研究趨勢，可說明不同的質量研究典範為試圖打破對立而所做的努力，相信若深入探究其他研究領域，此一方向都將要或已經成為各研究領域的新趨勢。

(二)存而不論觀點 (epoche)

劉駿州 (民 81) 借用現象學「存而不論」的概念，要求研究者專注於研究方法、研究主題與資料間關聯互動的本質，將其它非直接相關的文獻、思考、理論、假設先層層削減剝落，以浮現出方法、研究與資料結果間的關聯本質，之後再由此基礎，建構其與先前文獻、理論間的關聯性。因此在這種「存而不論」的基礎上，無論研究依循量化研究「問題－文獻探討－假設－資料蒐集－結果分析－結論」的研究模式，或質化研究「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討論－結論」的過程，都可以透過削減剝落、浮現建構的過程，發現研究與結果的本質 (劉駿州，民 81，106 頁)。這也就是說，研究者反省與深入研究的本質，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核心問題。

(三)後典範思想 (post-paradigmatic thought)：

Thompson (1989) 認為質與量的研究典範長久以來的爭辯乃在於對驗證真理的標準 (standards for testing truth) 看法對立，因此提出一個新的科學哲學觀，也就是後典範的思想，企圖超越質與量研究典範的爭辯。其重要論點有三：

1. 新的科學哲學必須承認所有的科學探索都充滿價值。
2. 新的科學哲學必須容許科學發現的詮釋，除了要考驗其與理論的一致性之外，也要用其它判準來考驗 (test)。
3. 新的科學哲學必須假定有世界實體存在於外，並且承認理論是世界實體的一部分。

很顯然，Thompson 企圖在第一個論點中緩和質與量研究典範的對立，提醒研究者放棄本位主義來看待各種不同取向的研究，承認科學研究的價值；在第二論點中 Thompson 則試圖融合質與量研究對真理的考驗的判準，認為研究者在新的研究發現出現時，應該能夠從多個角度來詮釋其意涵；而 Thompson 在第三個觀點中則希望能統一質與量研究者對世界實體的看法。如前所述實證論者假定世界實體是唯一且客觀存在的；但自然論者則認為世界實體是多元且為研究者主觀建構的。Thompson 為緩和此對立觀點，因此避開主、客觀論而主張，研究者應承認世界實體的存在，並且不論何種研究取向都是世

界實體中的一部份。

雖然這三個觀點對於整合質量研究法在方法論的對立各有不同的方向：「質化的經驗主義」強調從人類經驗的特性上找到質與量研究的共同點；「存而不論」則較強調放棄成見與對立，專注於研究題材、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性質的互動本質，而此觀點與「質化的經驗主義」的觀點都是從綜合的角度出發的；另外「後典範思想」則試圖建立一個新科學哲學觀來取代質量研究取向的長久對立。但不論是上述任何一個觀點，細究其內容主張，事實上都隱含著對研究者的一個期望，那就是以更開放、寬廣的心態去面對學術研究，或去進行學術研究，這種胸襟的建立或可與 Feyerabend (1975) 所主張的「方法無政府主義」(methodological anarchism)，強調讓任何學術研究自由地運作進行(anything goes!) 的觀念相呼應。

結 語：

質與量的研究法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的兩大重要研究取向，由於二者對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亦即量的研究累積了數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質的研究所主張的研究精神漸將成為學術研究的新潮流，因此 Patton 等諸多學者紛紛力主二者應與整合，使之能成為混合典範。

質與量研究法的整合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研究方法層面，另一則是方法論層面，學者們大多主張從研究方法層面著手進行質與量研究法的整合工作。但從本文的討論中發現質與量的研究若只在研究方法層面上整合，其實只是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並沒有解決或緩和質與量研究根本上的對立。

而若從方法論的層面來看質與量的研究的整合問題，因為基本上實證論與自然論對世界實體的看法是相衝突、對立的，除非提出不同於實證論與自然論以外的新觀點，否則很難消弭二者之對立於無形。因此本文嘗試提出「質化的經驗主義」、「存而不論」、「後典範思想」等觀念來描述當今學界的努力方向，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進一步思考。

誠如詹志禹、吳璧純(民81)所描述的，當今許多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或學生)常有如下的研究觀念：

1. 用常識去形成假設和預測，缺乏理論背景。

2. 乾脆不作假設，只企圖從大量的變數中去尋找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3. 以為用愈複雜的統計分析作的研究就是愈好的研究。

這些學術研究中的現象或許不能描述學術研究的全部實況，但若細細體察，卻也可發現有此現象的研究亦不在少數。而筆者認為缺乏對「科學知識」本質的探索、「世界觀」的探究等宏觀思考訓練與對話，是導致此現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試圖再提出「質與量研究之整合」此一學術研究上的重要問題，期望能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再投入一項刺激，所期望的無外是有識之飽學之士能對此類之討論有更多的反應與對話。最後，筆者願以三點建議與諸君共勉：

(一) 研究者當對研究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

不同的研究問題有不同的探究途徑，因而有學者在論及質量研究之整合時，認為以研究問題為導向是最簡單的策略，因此研究者對研究問題的深入瞭解應是決定使用何種研究取向的首要工作。學術研究最令人擔心的是常有研究者為了使用某種研究方法，而發展研究計畫，倒果為因，異化為研究方法的奴隸，因此使用研究方法的人本思想，值得再次強調（劉駿州，民81）。

(二) 研究者應重視釐清自己的世界觀：

在了解世界觀、哲學與認識論上的差異是質量研究的差異根源之後，研究者應進一步反求諸己，問問自己相信這個世界的本質為何？重新思考世界觀的問題。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動態、多變、且多元複雜的，那麼實驗法真的可以符合你對世界的假設，而幫助你看清研究問題嗎？如果不能，還有什麼途徑可以幫助你回答問題？……諸如此類的反省與思考，所帶來的自然結果便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如果研究者經常自省世界觀的問題，便能用更寬廣的心態，去應用各種可幫助自己回答問題的方法。

(三)在學術教育上應強調重視科學哲學的課程，以避免不自覺地培養出某研究典範的盲目跟從者：

當今國內學術研究的教育仍有以實證論為主的現象，例如：有許多大學研究所課程中，只見「實驗設計」為必修，卻不見科學哲學之相關課程；又如：國內諸多學術期刊僅接受「實證研究」之論文，而排除思考論述性之文章。這些現象常無形地窄化、限制了學術研究初學者的視野於不自覺中。因此，如何在教育的過程中，注入多元化的方法論課程，提昇問題的思考層次，使研究界的初學者能由宏觀到微觀、見「樹」又見「林」地思考，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參 考 文 獻

-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編著（民77）社會心理學。台北：空中大學用書。
- 王文科編譯（民79）質的教育研究法。台北：師大書苑發行。
- 江明修（民81）社會科學多重典範的爭辯：試論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整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四期，315 - 344 頁。
- 吳瓊恩（民78）從各學科典範變遷趨勢檢討公共組織理論實證研究的限制及其突破的可行性。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期，85 - 116 頁。
- 柯華威（民77）教室規矩——一個觀察研究報告。質的探討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師院。
- 洪錫井（民80）心理學質的研究之探討。政大心理所碩士論文。
- 詹志禹、吳璧純（民81）邏輯實證論的迷思。思與言第三十卷，第一期，101 - 121 頁。
- 歐用生（民78）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劉駿州（民81）「辨」而不「辯」——質量方法初探。新聞學研究第四十六集，95 - 109 頁。
- Anderson, J. A.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issues*. New York. McGraw-Hill.
- Bogdan, R. & Biklen, S.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an.
- Brewer, J. & Hunter, A. (1989). *Multimethod research : a synthesis of style*. Newbury Park, CA: Sage.
- Bryman, A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rserch*, London: Unwin Hyman.
- Christians, C. E. & Carey, J. W. (1981). The logic and aim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tempel G. H. III & Westley, B. H. (ed.) *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Erickson, F. (1973). What makes school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9, pp.58-69.

-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 Heider, F. (1974).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51, pp.358-374.
- Jensen, K. B. (1986). *Making senses of the news: towards a theory and an empirical model of reception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Qualitative audience research: toward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recep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1), pp.21-36.
- (1988).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reception analysis?, *Nordicom review of nordic mass communicatio* 4(1), pp.21-36.
- Jick, T. D. (1983). Mixing qualitative methods: triangulation in action. In Muanen, J. V. (e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CA: SAGE.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ull, J. (1990). *Inside family view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elevision's aud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Patton, M.Q. (1975). *Alternative evaluation research paradigm*, Grand Forks: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Press.
- (1991).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 Thompson, B. (1989). The pla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post-paradigmatic thought, In B. Thompson (ed.) *Advance i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volume 1*, London: JAI Press, pp.1-42.
- Wilson, S. (1977). The use of ethnographic techniq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7(1), pp.247-283.